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关注与互动: 不同青年对政治参与的观念认知和行为选择 (续)

共青团上海市委 | 最后更新: 2004-3-28

关注与互动: 不同青年对政治参与 的观念认知和行为选择 (续)

共青团上海市委

2、青年参加选举的原因分析

在本次调查中56%的青年参与了最近一次的投票。可以说这些青年已经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政治, 他们这些参与行为是不是有效呢? 这就要看他们选举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在选举时是如何表现他们的行为的。理想而言, 一个公民参与选举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他的公民责任感, 懂得参加投票既是自己的权利又是自己的义务; 另一方面, 他关心选举, 知道选举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 因而对选举有兴趣。假如一个公民是出于这两个原因去参与投票, 我们就可以说他的投票是有质量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 在参加选举的1446人中, 有接近三分之二的青年(63.5%)认为自己是主动行使公民的权利, 这个数据比1988年中国社科院的调查高出近30个百分点, 当然两次调查的对象不一样, 当时除了调查青年以外还包括其他年龄段的青年, 因此数据有较大的差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说明说明与十多年前相比, 但是公民的责任意识已有大幅度增加。

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在选举中有27.2%的青年选择“反正大家都搞形式主义, 选举也是过个场而已”, 与1988年的调查中类似的比率32.7%相比, 这种应付心态的人已经减少了5.5个百分点。尽管比率有所下降, 但是这个数据依然不能忽视, 因为27.2%的比率并不低, 也就是说有四分之一强的青年认为选举只是形式主义的事情, 有了这样的心态当然就没有了投票的兴趣和投票的热情, 只是遵循本单位的领导以及居委会干部的要求, 被动地进行投票。因此, 这样的选举行为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参与行为。

表4-27 青年参加选举的原因 (%)

选项	比例
主动行使公民的权利	63.5
不太想参加, 但经不住组织的动员	4.8

反正大家都搞形式主义，选举也是过个场而已	27.2
说不清	4.2

接下来我们对持有这种心态的青年根据其性别、年龄、单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面貌进行交互分析，观察不同青年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交互分析的结果如下：就性别而言，有这种态度的男女青年在各自参加选举人数的百分比差不多，男性占选举男性的26.7%，女性的同类比率为27.7%，仅相差1%，因此性别对这种态度的影响不明显。

就年龄而言，有这种态度的青年比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年龄在14-17岁之见的青年因为不满18周岁，未能参加选举，年龄18—24岁的参加选举的青年中有25.2%，而年龄在25-29岁的参加选举的青年中持相同看法的比率为28%，而年龄在30-35岁的参加选举的青年中，这个比率达到了31.5%。可见，年龄对选举心态还是有影响的，随着年龄的增加，对选举持消极看法的比率也增加了。

表 4-28 不同年龄段青年对于选举是形式主义的看法比较（%）

选 项	14-17	18-24	25-29	30-35
反正大家都搞形式主义，选举也是过个场而已	0	25.2	28.0	31.3

就单位而言，不同性质的单位中，持这种看法的青年在所有参加选举的属于该单位性质的比率略有不同，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该项比率为25.2%，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该比率为29.2%，在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持这种看法的比率最高为31.2%。

表 4-29 不同单位性质青年对于选举是形式主义的看法比较（%）

选 项	机关、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	国有企业和 集体企业	其他所有制 单位	其他
反正大家都搞形式主义，选举也是过个场而已	25.2	29.2	31.2	28.4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我们发现在参加选举的大学本科学历的青年中持有这种看法的比率最高，为29.3%，但是学历最高的研究生这个比率却只有21.9%，其他学历水平的青年有这种看法的比率上下相差不多。因此，我们无法说有这种看法的青年比率随着学历的上升而上升。和研究生学历的青年相比，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青年一方面对选举中的某些不足之处比较敏感，但是他们也许不像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那样，对存在的问题理解更加全面，态度也相对宽容。

就收入水平而言，交互分析以后的数据显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持这种消极看法的青年比率逐渐上升，特别是收入在3001-4000元之间和收入水平在4001以上的青年中，持这种看法的比率在同类青年中占到了35%以上，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月收入在4001元以上的青年中选择“主动行使公民的权利”的比率也是最低，只有46.7%，而其他收入水平的青年持相同看法的百分比都在60%以上。为什么收入水平越高，在选举态度上反而持消极的态度的人更多呢？收入水平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呢？

就政治面貌而言，交互分析的数据显示在身份为群众，也就是说身份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

的那些青年中，有这种消极看法的青年比率占同类青年的比率最高，达三分之一强。因此，如何引导群众如何正确对待选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3、青年如何处理选票

大部分青年对选举是抱有积极形态，参加选举就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具有如此之高的积极性青年到底是如何处理他们的选票的，他们会将神圣的一票投向谁呢？他们的投票行为是不是和他们主动行使政治权利的想法相一致呢？做为一个理想的有政治意识的公民，投票时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选择和判断候选人是否具有担任人民代表的资格、能力以及责任。

因此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题目，“参加选举时，您如何处理您的选票？”，答案有“按照上头的意思”，“依照亲友托付”，“参照舆论”，“个人判断”和“其他”。调查数据显示，总体参加选举的青年中45.6%青年认为自己投票时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有13.1%的青年选择了“参照舆论”，还有17.3%的青年选择了“按照上头的意思”，以及3.1%的青年是“依照亲友托付”来投票的。还有20.9%的青年选择了“其他”。可见，有近一半的青年在投票时确实是根据自己的个人判断来选择候选人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已具有较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在参加政治选举的时候，不人云亦云。但是，不可避免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权威的影响在青年的身上仍有所体现，17.3%的青年选择了“按照上头的意思”，何谓上头，上头就是权威，在权威之下某些青年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机会。这其实对我国的民主政体的发展是不利的，还好这样的青年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如果这部分青年比率大的话，势必影响民主政体的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表4-30 青年的投票依据（%）

选项	比例
按照上头的意思	17.3
依照亲友托付	3.1
参照舆论	13.1
个人判断	45.6
其他	20.9

交互分析后的数据显示：从男女性别来讲，基本上男女青年在这个问题上差别不大，投票的男青年中有46.8%是选择“个人判断”作为投票依据，该比率略高于女青年中的44.7%。女青年中参照舆论进行投票的比率比男青年高1.8个百分点。而男青年中依照亲友托付进行投票的比率比女青年高1.8个百分点。“按照上头的意思”选项中，女青年的百分比略高于男青年，但差别不大。

不同年龄段的青年对这个问题的选择也略有差异。年龄超过25岁的青年根据其“个人判断”进行投票的比率都超过50%，在年龄处于18-24岁之间的青年，该比率略低，为47.8%，而且其“依照亲友托付”的比率也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是，调查数据显示“按照上头的意思”进行投票的比率随着年龄的增加反而增加，这一点和我们原来预计的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比率应该降低的预测完全相反。和年龄有关的就是青年的身份，是不是在校青年和在职青年也有类似的关系呢？

从青年的身份来讲，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的差异非常明显。上面已经分析年龄增加伴随着选择“按照上头的意思”的比率上升，与身份进行交互分析后，也发现在职青年比在校学生在选择“按照上头的

意思”上比率要高3.5个百分点。但是在校大学生中，选择“依照亲友托付”的比率却又比在职青年高2.5个百分点。在选择“个人判断”在校青年比在校学生稍高。“参照舆论”进行投票方面，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的差异仅相差1%。

表4-31 不同身份青年的投票依据（%）

选项	在校学生	在职青年
按照上头的意思	19.1	22.6
依照亲友托付	7.7	2.2
参照舆论	17.2	16.2
个人判断	55.4	57.9

从青年的单位性质来分析的话，发现在其他类单位里工作的青年其“按照上头的意思”、“依照亲友托付”和“参照舆论”这三项的比率都是最高，与此相应的是根据“个人判断”的比率最低，只有36.1%。可见，在这类企业中工作的青年其权威意识较强，个人意识比较薄弱，因此青年在进行投票的是有很大部分的青年首先会考虑权威的意思，根据亲友的意见以及参照舆论，从而进行投票。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工作的青年其选择“按照上头的意思”进行投票的比率在四个选项中处于其次，为22.3%，这个比率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3到4个百分点。因此，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中，权威的力量对青年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形式的企业。

表4-32 不同单位性质青年的投票依据（%）

选项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	其他
按照上头的意思	22.3	18.0	19.5	24.1
依照亲友托付	2.0	2.5	2.1	7.2
参照舆论	14.0	15.4	10.3	14.5
个人判断	52.2	52.7	47.2	36.1

如果我们再从青年的收入水平来分析的话，在“按照上头的意思”选项中，收入为处于3001-4000元的青年选择其的比率最高，为26.6%，而其他年龄段的青年的百分比在18-22%之间，相差不大。但是在“参照舆论”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其比率基本呈下降的态势，其中收入水平在4001元以上的选举青年中，只有7.3%的青年表示他们的选举是根据舆论选择的。在根据“个人判断”方面，不同收入水平的青年有差异，但没有发现收入水平和其选择比率有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关系，收入水平在3001-4000元的青年其选择“个人判断”的比率最低，为46.8%，而最高的则是收入水平在2001-3000元水平的青年。

表4-33 不同收入水平青年的投票依据（%）

选 项	1000以下	1001-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以上
按照上头的意思	18.0	20.0	20.2	26.6	22.0
依照亲友托付	2.5	3.1	1.7	2.5	
参照舆论	17.7	14.0	14.1	8.9	7.3
个人判断	48.7	51.1	53.7	46.8	48.8

我们最后分别从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来分析。统计发现，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含同等学力）及以下的青年中和研究生中“按照上头的意思”的比例都比较低，但是差别在于高中学历以下的青年其根据“个人判断”投票的比例只有31.8%，远远低于其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根据政治面貌来分析的话，群众在“个人判断”方面的比例（40%）略低于青年共青团员（41.8%），低于党员（55.3%）15.3个百分点。

1、青年对选举结果的评价

从18周岁开始公民就有了神圣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样，在人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几十次的选举，每一次的选举对他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但是，人最擅长的就是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因此每一次的选举都是一种学习，选举的情况如何，选举的结果是否满意，都会影响他下一次参与选举以及参与其他政治行为。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到底如何。

表4-34 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

选 项	比 例
全部理想	5.9
大部分理想	34.4
半数理想	11.1
大部分不理想	8.1
全不理想	3.6
不清楚	16.6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的上海青年对选举的结果是比较满意的。5.9%的青年认为选举结果“全部理想”，34.4%的青年认为大部分理想，11.1%的青年则认为有半数理想的。认为选举结果“全不理想”和“大部分不理想”的青年只占到总体青年中的3.6%和8.1%。如果我们把“全部理想”和“大部分理想”作为积极看法，而“大部分不理想”和“全不理想”则作为消极看法，我们可以看到对选举结果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40.3%，而持消极看法的比例则为9.7%。因此，可以说当代青年对选举结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与那些对选举结果持肯定看法的青年相比，我们认为那些持有消极看法的青年更加值得关注。他们为什么会对选举结果产生不满意？是哪些人对选举结果产生不满呢？

交互分析发现，男性中对选举结果持消极看法的比例（14.1%）高于女性青年的比例（9.4%）。但是

男性持积极看法的比例（41.3%）也稍高于持积极看法的女性青年（39.4%）。

表4-35 不同性别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

选 项	男	女
积极看法	41.3	39.4
消极看法	14.1	9.4

如果从年龄分析的话，年龄段为18-24的青年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最低，为38.9%，其次是年龄为30-35岁之间的青年，比例为45.1%，最高的为年龄处于25-29岁的青年其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为47%。与此对应的是持消极看法的比例由低到高依次为年龄段18—24(13.6%)，年龄段30-35(12.7%)到年龄段25-29(11.5%)。

青年的身份与选举结果的评价也很有联系。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在消极看法的比例上相差不多，但在积极看法上两者差异非常显著，在校学生的比例明显低于在职青年，分别为28.6%和45%。该比例在校大学生中如此之低的原因也许在于在校大学生中有一部分年龄低于18周岁，他们没有参加过选举，因此他们对选举结果的看法有可能会脱离现实。

如果从青年的单位性质来分析的话，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与单位的性质也是相关的。在三类企业中，持积极看法的比例呈阶梯状分布，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比例最高为50.4%，其次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44.2%），其他所有制形式单位仅为36.4%。而消极看法的比例则刚好相反。

表4-36 不同单位性质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

选项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
积极看法	50.4	44.2	36.4
消极看法	10.5	12.4	12.8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选举结果的评价的话，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和选举评价也是相联系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初中及以下和高中（含同等学历）的青年中，持积极看法的比例只有30%左右，不到三分之一，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专和本科的青年该比例则达到45.7%和43.4%。但是例外的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研究生中持积极看法的比例也只有35.6%。

表4-37 不同受教育程度青年对选举结果的看法（%）

选 项	初中及以下	高中（同等学历）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积极看法	30.4	31.3	45.7	43.4	35.6
消极看法	5.4	8.0	12.6	13.7	10.8

选举结果和青年的政治面貌进行交互分析的话，发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普通群众在选举结果

的评价上差异较小，群众略低于共产党员，但这与我们原来预想的党团员和普通群众在选举结果的看法上可能会存在较大的差异不相一致。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青年群体，对选举结果的评价是各不相同的。总体而言，男青年比女青年无论在积极看法上还是在消极看法上都要高于女青年。学生的评价低于在职青年的评价。受教育程度高的青年其评价则基本低于学历程度较低的青年。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了青年对选举的评价呢？我们认为影响青年对选举结果看法的因素众多，上面分析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身份等等都是原因，但是这些因素不应该是直接原因，在关键的其实在于青年对选举行为本身看法及其期待。正如上面分析的，我们发现那些将选举看成形式主义的人，他们的评价是较低的，另外，那些对选举抱有很高期望的人，对选举结果的评价也不高。

青年的政治能力以及参与方式偏好

影响青年政治参与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参与者的主体因素，参与的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政治参与的客体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决定了青年的政治参与现状。青年的主体因素除了前面两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上海当代青年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他们目前实际的参与经历以外，青年的政治能力或者政治素质也是影响青年参与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节中首先分析青年的政治能力的现状，其次，我们分析青年具体的政治参与方式以及他们对这些参与方式的评价。

青年的政治能力

政治能力，就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上的能力。张明澍在《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认为政治素质包括政治观念、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三个部分（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他说这三个部分在公民的政治素质中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政治观念决定公民愿不愿意参与政治，知识和技术决定青年能不能参与，而参与经验则决定参与的效果和效率。在本节中我们分析的主要是青年已经拥有的政治参与的能力，包括主观上的能力感，责任感和对社会的信任感，客观上的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术。因为青年对政治制度、政治知识的掌握情况已在第三章中作了详细分析，这里主要是引用一些结论，这里主要分析的还是青年主观上的那些能力。

根据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公民责任感，公民能力感，以及公民的参与经历对公民的政治参与有非常大的影响。首先，如果一个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有能力，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可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时，就越有可能积极地参与政治；其次，个人越是对社会和国家有一种责任心，也就越有可能参与政治。再次，公民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社会组织等场合的参与经验必然影响其在政治系统的参与积极性。最后，青年若对社会有一种信任感的话，他就越有可能和他人进行合作，参与政治。因此我们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青年的政治能力进行分析。

1、青年的责任感

青年的责任感就是青年的政治责任意识，这可以说也是青年的基本政治态度的一部分。青年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才会积极关注国家的各项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因此青年的责任感是青年参与政治的重要部分。上文已经分析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基本态度，即总体上有49.8%的青年认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而明确表示“不介入政治”的青年只占总人数的8.5%。这其实也是青年的政治责任感的重要表现。在问卷中，我们让青年表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72.4%的青年选择了“赞同”，22.7%的青

年选择了“基本赞同”，两者之后超过了95%，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青年都认为青年应对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可见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青年的思想呈现了多元性，但是青年对国家和社会仍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这一点，我们也可从另外一个类似题目的回答中得到证实。当调查问到是否对“为政府献计献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的看法是，28.2%的青年表示赞同，51.6%的青年表示基本赞同，两者之和达到79.8%。11.5%的青年表示不大赞同，明确表示不赞同的青年则只有2.2%。对这个看法进行交互分析后，发现女青年对这种看法持肯定意见的比例高于男青年4个百分点。年龄段在14-17岁的青年表示赞同的比例达到了50%以上，而其他年龄段的青年接近总体的28.2%，如果把赞同和基本赞同统称为肯定意见的话，年龄段为14-17岁的为87.4%，其余依次为25-29（80.4%），30-35（79.6%），18-24（77.7%）。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持肯定看法的意见类似，无明显差异。从行业来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持肯定意见的比例最高（83.1%），而其他行业的比例相对较低，其余差不多。

表4-38 青年对“为政府献计献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的看法（%）

选 项	赞同	基本赞同	不大赞同	不赞同	说不清
为政府献计献策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	28.2	51.6	11.5	2.2	4.8

2、青年的能力感

青年的能力感是青年对自己能力的主观感受，包括对自己能力的评估以及对自己能否影响他人、社会以及政策的预计。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的能力较高，他必定会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如果政治能力较高，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必然增加。为了了解青年对自己的能力评价如何，我们设计了三个相互联系的题目，首先让青年自己评价自己的政治能力到底如何；其次，让青年评价自己对政策的影响能力，这是政治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使青年认为自己很有能力，但若他认为他的政治参与行为不会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其他活动，他的参与积极性就有可能下降。

在问及“您觉得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如何？”的问题中，有7.6%的青年认为自己参与政治的能力很强，有23%的青年认为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强，有57.7%的青年认为自己的能力一般，只有7.7%或2.5%的青年认为自己的政治活动能力较差，或者非常差。因此，在所有的青年里只有10%左右的青年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表现出不自信，而近三分之一的青年对自己参与政治的能力非常自信，还有一半的青年对自己的能力持折衷的态度，不肯定也不否定。与国外的同类研究相比，对自己的能力持非常肯定态度的青年比率远高于其他一些国家的青年。

表4-39 青年对自己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估（%）

选 项	很强	强	一般	较差	很差
您觉得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如何？	7.6	23.0	57.7	7.7	2.5

进一步交互分析之后的数据显示：在性别上，男青年的主观能力高于女青年的主观能力。在男青年中，35.9%的青年认为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强或较强，持有相同看法的女青年则只有25.8%，两者相差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能力较差或很差的女青年比率则高于男青年3个百分点。可见，男女青年在政治能力

的主观评价上存在较大的差异，男青年比女青年在政治能力上表现得更为自信。

与年龄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年的政治能力感逐渐下降，年龄段处于14—17岁的青年其表示能力很强的比率最高达到15%，而年龄处于25-29和30-35岁的青年中这个比率则只有5.5%和5.6%。同样在表示能力强的青年中，年龄段为14-17的青年的选择比率也高于其他年龄段的青年6-8个百分点。但是，我们也发现各个年龄段的青年其表示能力“很差”的百分比相差不多，而且似乎随着年龄的上升，这个比率呈现日益下降的态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在于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年对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认识也日益清晰。另外，我们推测随着年龄的增加，各种社会阅历使得青年遭受挫折的机会也增加了，因此对个人的能力不再像14-17岁的青年那样充满理想色彩。

表4-40 不同年龄青年对自己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估（%）

选项	14-17	18-24	25-29	30-35
很强	15	8.8	5.5	5.6
强	29.6	23.7	21.2	21.4
一般	47.1	54.9	61.6	61.7
较差	4.4	7.7	8.3	8.3
很差	2.9	2.7	2.4	2.1

与身份进行交互分析，我们也发现对自己政治能力主观评价的高低与青年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总体上在校青年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价高于在职青年。

与单位进行分析之后的数据显示，青年的政治主观能力与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和行业没什么明显的关系。在于行业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单位性质属于第三产业的青年，其主观能力的评价相对低于第二产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行业以及其他行业。其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企业工作的青年表示其政治能力很强或很强的青年最多，两者之和达到32%，高于其他任何行业。

一般而言，经济基础越好，对自己的主观评价也应该更高，那么经济收入是否也影响他的政治能力呢？与收入水平进行交互分析之后的数据也显示经济收入水平确实影响青年的政治主观能力。调查中，收入水平处于最高（4001元以上）的青年中，表示其能力“很强”和“强”的比率最高，其和达到34.1%，而其他收入水平的青年这个比率分别为29.1%、25%、28.7%和23.1%。我们发现收入水平处于1001到2000元的青年，尽管他们的收入水平不高，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进一步分析显示，这部分青年主要是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尽管他们目前的经济地位一般，但他们还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表4-41 不同收入水平青年对自己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估（%）

选项	1000元以下	1001-2000	2001-3000	3001-4000	4001元以上
很强	6.6	4.6	6.4	3.8	7.3
强	16.5	24.1	18.6	25.3	26.8
一般	63.6	60.4	63.7	60.8	61.0

较差	9.5	7.1	8.0	7.6	4.9
很差	2.8	2.6	2.2		

与政治身份进行交互分析之后发现，共产党员的主观能力评价最高，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持肯定意见的比率达到34%，其次是共青团员，该比率为30.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群众对自己的政治能力评价，他们对自己的政治能力持肯定意见的只达到20%。

青年的主观能力高低也与他们目前的生活现状相关，数据显示在对生活现状十分满意的人中，有43.4%的青年认为他们的政治能力非常强，远远高于总体的平均数，而这些人认为自己能力很差的比例只为0.9%。相反，在对生活表示很不满意的人中间，虽然也有10.7%的人表示自己的政治能力很强，但是认为自己政治能力很差的人也是10.7%，这个比例也远远高于其他青年。因此，青年的主观能力与他们目前的生活现状是有密切联系的。

表4-42 生活满意状况与政治能力的主观评估（%）

选 项	十分满意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很不满意
很强	43.4	6.6	5.3	7.0	10.7
强	20.8	30.5	19.5	20.9	16.1
一般	28.3	54.6	63.3	55.3	44.6
较差	3.8	6.1	7.9	12.3	17.9
很差	.9	1.5	2.7	3.7	10.7

与青年的政治能力相关的另外两个类似的问题是“假设政府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政策，而您有很多想法，您有信心使政府采纳您的意见吗？”和“假设您被选举为本区的人大代表，您有信心履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职责吗？”如果说上面的问题从直接的角度让青年描述其政治能力，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以间接的方式了解青年的能力，看看不同的问题方式，其测试结果是否相同。

在问及“假设政府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政策，而您有很多想法，您有信心使政府采纳您的意见吗？”时，14.7%的青年表示“充满信心”，31.4%的青年表示“比较有信心”，认为一般和信心不足的青年只有17.3%。类似地，在问题“假设您被选举为本区的人大代表，您有信心履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职责吗？”的回答上，青年也显示出强烈的自信，39%的青年认为自己对本区人大代表“充满信心”，36.8%的青年选择了“比较有信心”，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青年对自己当区人大代表深有信心。只有17%的青年选择一般和5.7%的青年表示“信心不足”。尽管青年直接地回答自己有很强的政治能力的青年比率不算特别高，但他们表示对本区人大代表的信心依然非常强，可见，有些青年在其主观能力的评价上是低估的，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向重视谦虚的美德有关。

交互分析发现的结果同上面青年的主观能力的评价分析类似，如男青年比女青年更加有信心使政府采纳他的意见，更有信心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随着年龄的增加，这种信心就逐渐降低，而且在校青年比在职青年更有信心等等。

3、青年的社会参与机会与政治能力感

前面已经分析到上海的青年有较强的政治能力感，但是不同的青年其政治能力的评价是不平衡

的，生活现状比较满意的、收入水平较高的青年对自己的能力评价比较高，政治参与意识也很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也比较多。西方的政治社会化理论认为青年的政治参与能力与早年的社会参与机会有关，首先是家庭中的决策参与，其次是学校中决策参与，工作单位的参与，这些参与经历会对政治参与产生一个累积的影响。

为了考察青年在学校中的民主参与情况，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学校时，如果老师的话不对，您有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15.2%的青年选择了“经常有”，67.6%的青年则选择了“偶尔有”，选择“从未有”的青年则只有15.4%。深入分析发现，在选择“经常有”的369名青年中，几乎一半的青年表示主观能力感（68名）或强（115名），可见青年的政治主观能力感的高低应与其在学校、家庭中的民主参与有关，相关系数见下表。

表4-42 学校和单位参与和青年的政治能力（%）

选 项	经常有	偶尔有	从未有	与政治能力的相关系数r(显著系数为0.01)
在学校时，如果老师的话不对，您有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	15.2	67.6	15.4	0.282
在学校里，您有没有主动要求担任班干部或学生会干部？	19.2	40.7	38.3	0.314
如果您对单位的某些事务有意见，您提出过反对意见吗？	13.3	62.9	20.0	0.284
在单位里，您有没有主动要求担任一些职责之外的管理工作？	15.5	48.9	31.4	0.296

在前面分析青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时候，我们曾经引用了2002年关于青年参加社会组织的数据表明青年积极参与各类社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活动，如参与过希望工程，14.3%的青年已经加入正式社团，有32.4%的青年同时参加了两个以上的业余社团。79.2%的青年参加了发烧爱好类的业余团体，71.3%的青年参加了情感交流联谊类的社团，59.9%的青年加入娱乐休闲类的社团，教育学习类社团也达到47.8%。尽管在社会竞争越来越激励的时候，青年参加各类社团组织的目的主要还是相互交流学习、锻炼处事能力以及结交对自己有益的朋友。但是这种主动型的组织参与对青年的政治参与能力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国外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3、青年对社会环境的信任感

根据国外的政治理论研究发现公民对社会的信任感可以转变成政治上的相互信任。例如，在美英等国，越对他人怀有这种信任，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进行合作。20世纪60至70年代对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东南亚各国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普遍的社会不信任现象的存在。例如，亨廷顿认为阿拉伯世界，互相不信任很早就渗入到儿童的价值观念中，人们缺乏组织性，对政府和他人缺乏忠诚度和信任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注重诚信二字，可谓“民无信则不立”，但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建立诚信体系。但是，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问卷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题目“如果您被邀请在某个公开场合就某一个敏感话题发表观

点时，您会如何反应。”通过青年的态度判断他们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的感知，从而推测他们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程度，调查数据显示的情况不容乐观，只有22.7%的青年会“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和主流观点相符”，而25.3%的青年会“比较谨慎地掩盖自己地真实想法，尽量使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相符”，有11.1%的青年则选择“尽量不发表自己的观点”，38.6%的青年则会“看具体是什么场合”。当然这种情况跟青年对政治的基本认知是有关系的，交叉分析发现在认为政治是“阴谋与暴力”和“坏事情”的青年中选择谨慎地掩盖自己的想法的青年比例就比较高，而选择“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和主流观点相符。”但是，我们觉得青年这种小心谨慎的心态中，体现着他们对社会和他人的不信任现象，这种不信任势必会直接影响他们和他人进行政治合作。

表4-43 青年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的情况（%）

选 项	比 例
比较谨慎地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尽量使自己的观点和主流观点相符	25.3
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管这个观点是否和主流观点相符	22.7
尽量不发表自己的观点	11.1
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场合	38.6

4、青年认为最重要的参与条件

既然影响青年参与的因素众多，但是青年自己又是如何评价这些影响参与的因素呢？什么才是决定政治参与的最主要的条件呢？从下表中我们发现青年对各个影响因素的评价都差不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相比较而言，选择“参政议政的观念和意识”的比例稍高，为19.1%，其次是“规范的制度保障（如政府提供的有效渠道）”、“参政议政的能力，参政议政的热情”、“鼓励青年参政议政的良好舆论氛围”、“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最后一位是“领导的支持鼓励”。尽管青年对这些影响因素的评价稍有差别，但是总体而言，在青年们看来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了提高青年的参与积极性和行为有效度的时候，对所有这些因素都应该非常关注，要齐头并进，不能又是偏颇，但是还要看到不同的青年群体，其关注的因素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男青年中最注重规范的制度保障，而女青年则更为注重参政议政的观念和意识。而在年龄段为14-17岁的青年中，他们则认为参政议政的热情是最为重要的。年龄段18-24岁以及年龄段30-35岁的青年则更为注重参政议政的观念和能力，25-29岁的青年则选择规范的制度保障。

表4-44 青年认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些内部和外部条件中当前最重要的是（%）

选 项	比 例
参政议政的热情	13.3
参政议政的能力	13.7
参政议政的观念和意识	19.1
领导的支持鼓励	5.0

规范的制度保障（如政府提供的有效渠道）	16.5
鼓励青年参政议政的良好舆论氛围	13.3
共青团、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9.8

总而言之，调查结果显示青年既有较强的公民能力感，而且青年的政府责任意识较强，对国家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青年对自己参与政治的能力充满信心，也认为自己有能力担任人民代表，但对自己是否能够影响政府的决策信心不足。青年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技巧还有待提高。而且，青年长期以来在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工作单位中的参与（政治社会化）影响青年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倾向。总之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哪个程度分析，总体上当代的上海青年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的的能力非常自信。既然青年对自己的政治活动能力非常自信，那么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呢？这是我们目前建立民主政治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课题。但是青年的政治能力真如他们自己评价的那么高吗？在第二章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青年对“死知识”的认知还是不容乐观，在某些政治技巧上还有欠缺。因此，为了提高青年的政治参与能力，充分利用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我们必须加强对青年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巧的教育，使得青年在自己的主观能力提高的同时，实际参与能力也得到提高，从而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更好地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

青年对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政治参与的方式有很多，有定期的选举也有不定期的讨论，既有法律规定的正式方式也有非正式的方式，如给领导人写信、给工会等机构反映问题。在所有这些参与方式中，上海的当代青年比较喜欢哪些，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什么方式，不同的青年在参与方式的偏好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1、对于市政动迁中处置不公的青年可能采取的行为

对于上海的青年来说，由于旧区改造或者市政建设，被迫进行动迁是可能的事情。在市政动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管理漏洞，导致青年市民的利益受损。对于这种情况，青年会采取什么形式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干预呢？我们根据这两年的新情况和宪法规定，列出了十二种可能的方式供青年选择。下表列出的是青年的第一和第二选择。为了更好地表示青年对不同参与方式的偏好程度，我们对他们的选择进行加权（第一选择×2 + 第二选择）。

表4-45 青年对各种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

选 项	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	加权以后
向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反映	17.3	11.2	45.8
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将政府告上法院	8.2	17.1	33.5
到所在地区政府（包括信访部门）反映	40.6	11.5	92.7
向自己所在单位领导反映	4.2	3.8	12.2
向代表自己的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反映问题	5.6	4.7	15.9
通过私人关系托政府官员帮忙解决	6.4	4.2	17

联系新闻媒体进行曝光	4.9	13.7	23.5
联系相同境遇的人，申请在政府门前游行或静坐	0.9	1.3	3.1
不经批准，在政府或领导家门前静坐或拦领导的车	0.3	0.4	1
利用网上论坛公布事情真相，引起公众注意	1.6	3.5	6.7
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2.1	4.7	8.9
坚决不搬，做“钉子户”	2.9	5.2	11
其他	1.5	3.2	6.2
未答	3.5	15.3	

加权以后的结果显示，处于前三位的是“到所在地区政府(包括信访部门)反映”、“向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反映”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将政府告到法院”、“联系新闻媒体进行曝光”处于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最后两位的是“联系相同境遇的人，申请在政府门前游行或静坐”，“不经批准，在政府或领导家门前静坐或拦领导的车。”

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青年选择政治参与方式最大特点：青年政治参与方式趋于理性化。与80年代青年的政治参与方式相比，当代青年当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不再冲动，不再以呼吁、呐喊的方式参与社会，游行或类似游行的静坐不再是青年喜欢的参与政治的方式，相反，它们已经成为青年最不愿意选择的方式。依靠政府和依靠组织依然是青年最喜欢的参与方式，青年更愿意向政府反映，向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反映。向本单位领导反映的现象与以前相比已有明显降低，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因此，尽管企业对青年的生活依然举足轻重，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青年不再有习惯于有困难找领导的思维模式。另外，在参与方式的选择上另一个令人发思的现象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将政府告到法院”竟然在所有的参与方式上处于第三。在中国传统思想里，政府是绝对的权威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民告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现代的青年竟然敢于对政府提起诉讼，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是思想观念的解放，也是青年民主意识增强的有力见证。

2、青年对各种政治参与途径的评价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分析了青年可以有多种方式参与政治，那么，在青年的心目中，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什么呢？记得在本章第二节中，我们假设青年在市政搬迁过程中如果利益受损情况下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行为，从而分析青年在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在这里我们又询问青年，青年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什么。乍看之下可能会认为这是同一个问题，其实他们相互联系但又各有侧重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是青年遇到问题的时候所采取具体方式，第二个问题其实针对的是参政议政，询问青年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是什么，这些途径有些可能不能用来解决某些具体的问题。

我们列出了8条可能作为参政议政途径的选项，让青年们选择。下表是青年选择的结果。我们发现，除了有36.1%的青年选择了“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以外，每一个选项的比例都不是特别的高。处于前几位的是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36.1%）、参加选举人大代表（14.3%）、当公务员（11.2%）、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选举（10%）。其他的“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信或提建议”、“向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等比例都在10%以下。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参与途径中“参加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这种方式都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不同青年群体的信赖，把它作为青年参与政治的最主要的途径，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各级政府和青年工作者的重视。与传统的政治参与方式相比，这种方式有以下几个优势：第一，青年以兴趣或者以共同的爱好参加这些社团，青年对自己的团体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比较满足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第二，各类社会团体可以满足青年参与的愿望和提高自己的参与能力。第三，一般各类社会组织都有较大的规模，但是成员之间信息流通非常快，在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规模效应。因此，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必须发挥青年通过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参与政治的优势，同时也要引导青年如何正确有序的参与政治。

表4-46 青年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

选 项	比 例
当公务员	11.2
选举人大代表	14.3
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	36.1
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信或提建议	6.0
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6.0
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	4.5
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选举	10.3

那么不同群体的青年对途径的选择存在不同吗？交叉分析发现，在男女青年中，女青年选择“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以及“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等选项上的比例略高于男青年。但男青年在选择“当公务员”、“选举人民代表”和“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信或提建议”等的选项上比例略高于女青年。似乎女青年更倾向于通过组织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而男青年则更倾向于采取个人的形式来参政议政。

在校学生和在职青年在途径的选择上也存在差异。在职青年比在校学生更倾向于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在这个比例上在职青年的比例高出在校学生12个百分点。在校学生选择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选举”、“当公务员”、“参加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等比例高于在职青年。对于青年学生来讲，学生会可以说是校园内他们最熟悉、也是影响最大的组织，因此与在职青年参加工会组织相比，他们更愿意参加学生会选举。

表4-47 不同身份青年对参政议政途径的看法（%）

选 项	在校学生	在职青年
当公务员	13.5	10.2
选举人大代表	17.0	13.0
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	27.4	40.1

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信或提建议	8.1	5.1
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5.7	6.3
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	3.8	4.9
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选举	14.2	8.7
其他	5.5	7.0

统计数据也显示青年的收入水平和参与途径的选择也是有关系的，在其他收入水平青年的选择中位于前几位的“当公务员”，在收入水平为4001元以上的青年的选择中仅排到了第五位。收入水平在4001元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青年在“选举人大代表”选项方面比例较高，尤其是收入水平在4001元以上的青年中，比例为19.5%。在不同收入水平的青年中，选择“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作为主要参政议政途径的比例都是最高，但表现得不平衡，在4001元以下的青年中这个比例似乎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收入在4001元以上的青年中，这个比例就从51.9%突然滑落到了34.1%，下降了17个百分点。

表4-48 不同收入水平青年对参政议政途径的看法（%）

选 项	1000以下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4000	4001以上
当公务员	11.4	10.1	10.8	10.1	4.9
选举人大代表	15.5	12.3	12.7	8.9	19.5
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 青年组织	37.7	38.4	42.7	51.9	34.1
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 信或提建议	5.1	4.6	5.8	5.1	7.3
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反映情况	4.7	7.5	5.0	5.1	2.4
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	4.7	4.9	4.4	6.3	7.3
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 大会等选举	7.3	10.8	6.1	7.6	4.9
其 他	8.2	6.9	7.8	2.5	12.2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受教育程度是影响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变量，在这个看法上受教育程度没有体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但是，依然值得注意的是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水平的青年，他们中突出的是有四分之一的青年选择了“选举人大代表”，但是其选择“当公务员”的比例则只有3.6%，而

在其他受教育程度的青年中选择该选项的比例都是10%以上。

表4-49 不同文化程度青年对参政议政途径的看法 (%)

选 项	初中及 以下	高中(同等 学历)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及以上
当公务员	3.6	11.5	11.0	11.7	10.2
选举人大代表	25.0	13.0	14.1	14.7	13.6
参加合法的社会团体和青年组织	33.9	34.3	39.9	35.4	33.9
给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写信或提建议	5.4	7.5	3.9	6.7	3.4
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情况	1.8	3.8	6.5	7.1	5.1
向新闻媒体发表意见	1.8	5.7	4.3	3.8	8.5
参加学生会或职工代表大会等选举	14.3	12.4	10.0	8.8	13.6
其 他	8.9	7.5	6.2	6.5	3.4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调整。在政治领域,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朝气蓬勃的青年有非常高的政治参与意识,这种表现意识既表现在他们对政治的感兴趣,而且他们也积极参与到各类社会团体。而且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青年也表现出来非常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参与范围逐步扩大。但是,与其政治参与意识相比其实际参与还是存在着不够充分的现象,尤其是在选举中,有些青年对选举持有形式主义的看法,参与不够积极主动。青年在政治参与方式的选择上日趋理性,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相比,他们把政治参与的焦点已经转移到了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行动上来。最后,在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中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社会团体,尤其后者)与青年的政治参与。他们积极参与这些组织势必对他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和途径产生深远的影响。(全文完)

(原载《政治文明与当代青年》“主体报告·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责任编辑:杨长征、木新月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 louke11@yahoo.com.cn



